

信息经济对传统理论的八个挑战

共享信息价值与追求超额利润已成为后现代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可能是信息产业发展实践向传统理论提出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

■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一、信息共享对产品稀缺理论的挑战

工业社会使人们养成更多占有物质财富的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去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还是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但另一方面，无限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像喝了过量的啤酒还要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煤炭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产品，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 20 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庄大道已到尽头。现代经济的病根就在于急功近利、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

而发展信息生产力，可以大量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消费理性，淡化人们的物质占有欲望。如果说工业经济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稀缺性和占有性的矛盾，而信息经济的基础资源不再稀缺，消费方式也从占有性转为共享性，成本曲线与价值实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享信息价值与追求超额利润已成为后现代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可能是信息产业发展实践向传统理论提出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

二、网络精神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 200 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20 世纪末，一场经济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一些大腕学者还把美国的经济个人主义精神提高到“世界共识”的高度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介。

其实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信息经济活动的增长进一步证明，完全依靠经济个人主义根本形不成网络生产力，网络的天然规则就是平等、合作和互动。1994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利己主义博弈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 200 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社会最大福利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2006 年，他又在《三人演化合作博弈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如果交互的生物体或人类被假定为仅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并且促使彼此之间合作的本能来引导”。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正在形成，那就是：一个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能成功的基础之上。

三、网络诚信对商业技巧的挑战

常能听到一些学者阐述同一个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以诚信为前提的经济，但是我国社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几乎俯拾皆是。你到我国城市的商店走一走，价格不透明是家常便饭，几乎所有商家挖空心思制造信息不对称，利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了解实情)赚取超额利润。广大消费者天天都在受骗，也许你今天受了骗，明天换一个位置去欺骗别人。有人还将这种不诚信行为奉为商业机巧，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向。其实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都会明码标价、资费趋向简单透明，只有陷入市场达尔文主义，才会出现严重的假冒伪劣、价格纷乱，面临严重的诚信危机。

进入电子商务阶段，诚信缺失是网上交易的大敌，传统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失效，只有借助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社会化监督

和网络透明的协同机制才能使人类社会回归理性，并实现公平交易。

四、价值最大化对利润最大化的挑战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日益透明，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变化。在股份制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当然要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在股份制制的中期阶段，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品牌业绩和股票升值；股份制企业发展到第三阶段，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必须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默克制药集团的缔造者乔治·默克说：“应该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认为，过去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索取最大利润，现在的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贡献最大价值。

五、收益递增对收益递减的挑战

工业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

信息经济的主要原料是沙子(硅)和信息，由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这也就意味企业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学会利用这种收益递增规律去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而是相反，继续采用传统市场规则和制度，进行牛奶撇油，保护既得利益。

某些企业则开始利用收益递增规律攫取超额利润，实现快速扩张，占据垄断地位。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实现有效竞争。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松散分布型、具有专业化优势企业集团。

六、穷人市场对富人市场的挑战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的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利用信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差距的洗牌。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组织在拉丁美洲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信息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社会尚缺少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一个重要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要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2011 年，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宽带战略中再次强调对承担宽带普遍服务企业的优惠政策。由于美国的示范作用，许多国家也开始重视电信普遍服务和社会公共责任。

各国重视普遍服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于大众市场。美国的铱星计划，新加坡的 CDMA 移动通信系统就是因为脱离大众市场



而告失败。所以除了政策、制度环境之外，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为穷人服务的社会责任，21 世纪将是以前大众市场为核心的伟大世纪。

七、网络协同对自由竞争的挑战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学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参与竞争，一切经济政策和法律也都是各种力量维护各自利益的结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整个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大赌场，就看谁的赌技高超，胜者王侯败者寇，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和公理！

如何才能平衡这个社会呢？经济自由主义义论者认为一个重要平衡机制就是政府也作为参赌一方，靠“政策和对策”的互动，逐步完善一个法制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倡导人们自私自利，倡导人们去钻法律空子，这样逐步健全法制。

那么，靠这种博弈互动究竟能不能完善一个法制社会呢？事实证明是不能的。因为法律属于正式约束，它只适用少量典型的个体纠纷。而大量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必须靠非正式约束(道德、公理和社会监督氛围)实现平衡。指望任何纠纷和冲突都诉诸法律，高昂的交易成本使任何社会都难以运转。

三十年来，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只学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如果美国社会只有科学加弱肉强食这两种精神，美国社会早就失衡了。美国社会还有第三种精神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氛围，它对美国社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试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弱势群体、平民百姓受了委屈谁告得起状？如果我们的理论提倡每个人都去占对方的便宜，然后再让对方也变得“聪明”起来，我们的社会将陷入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泥沼。人类对待自然环境已经走过了一条先破坏、后治理的弯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正在破坏人为环境，而要修复人为环境，可能要比修复自然环境更难。

信息经济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平台，使得人们各种行为赫然网上。你遵纪守法、讲诚信，网络让你不再吃亏；你若是个阴一套、阳一套的卑鄙小人，网络也会让你无处藏身。网络正在编织一个日益透明的地球村庄，使大家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中，快速形成一种你想活就必须也让别人活，你想活得好就必须也让别人活得好的一种刚性约束机制，也可以把它称作“软法律”。

八、互组织化对被组织化的挑战

工业社会适合集中化的宝塔结构下的被组织理念，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电影，人被困在大机器上就是这种理念的生动体现。

电信促进了工业时代的成熟，同时又孕育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电话网仍然保留了工业经济理念，比如分级交换、宝塔结构、集中控制，那么，以 IP 技术为核心的下一代网络必然走向无级交换、扁平结构、分布控制。换句话说，未来支撑信息社会的是一种开放的、透明网络和高智能的互组织化终端。技术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信息经济正在把人类社会从集中化、被组织阶段推向分布化、互组织阶段。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大企业曾经在许多国家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20 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家资本主义影响下，许多欧洲国家和前苏联都扩大了这种国有经济成分。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控制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经济，它比较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进入 80 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具有互组织的活力，更适应社会化发展方向。

网络产业实践也进一步证明，小私有企业和国有大企业都不再适合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生产力更适应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管理的属性，我们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

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经济制度不可能回归个人主义，也不会重建国家垄断的辉煌。而是沿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

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832 页)”的方向，进入一个与新兴生产力相适应的、崭新的信息社会阶段。

(《网络钟型社会——公共理性经济革命》节选)

民间融资 规范靠法治

最近，民间融资又曝多起大案。在笔者看来，这些集资案的主角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其个人悲剧，与近年来规范民间融资相关法规滞后有很大关系。

首先，民间融资法律规范“千呼万唤难出面”。尽管政府部门已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草案，但至今尚无出台预期。实践中，民间融资活动已成常态。由此，打破民间融资法治滞后现状，尽快将其纳入规范化轨道并走向阳光化迫在眉睫。在国家立法未完成之际，至少可以加快制订民间融资管理地方性法规，建立民间融资登记管理制度，设立民间借贷和融资交易平台，有效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和防控风险。

其次，民间资金流动渠道“十里九回难通畅”。民间融资活动无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资金投资渠道不畅。国务院虽先后颁布了新“36 条”，但垄断行业仍存在“玻璃门”和“弹簧门”，阻滞了民间资金有效流动。尽管铁路、电信等行业对民资放开了口子，但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民资不愿进入。民资希望进入的金融领域，门槛依然较高。可见，为民资寻找投资渠道的道路依然漫长。当前，应借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东风，打破金融垄断，降低民资进入银行门槛，引导民资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或民营银行。同时拓宽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放宽中小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条件，吸收民间资金。

再次，民间融资活动监督不应“藏在深闺人未识”。眼下对民间融资活动缺乏专门监管机构，各级政府虽成立了打击处理非法集资办公室，但无常设力量，仅挂靠政府名义，办公室放在当地银监局，成了银监部门的“独角戏”，对民间融资活动反映迟缓，缺乏实质管控措施。对民间融资规模、民间融资活动频次和苗头等等心中无数，更谈不上前瞻性预防措施。当问题爆发时，只能充当“救火员”和“马后炮”角色，于事无补。应改变当前监管松散无力状况，健全监督组织机构，充实监管力量，对监管不力、导致民间融资活动混乱，频繁发生大案并造成社会危害的地区，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此外，民间融资宣传引导不能“像雾像雨又像风”。民间融资存在的乱象，除了与当事人逐利本性直接相关，与相应的宣传引导存在短板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民众对非法融资活动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受到高息诱饵的欺骗。对此，必须主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各类媒体开展经常性宣传引导，把民间高息融资活动的危害性和各种手段公之于众，提高民众风险识别能力，拒绝参与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活动，从而阻止非法融资活动的蔓延。

(经济日报)

外眼看中国

报告称中国买家正斥巨资投资海外房地产市场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报道，大型全球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ichard·Ellis)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富裕中国人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金额将达数十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是中国买家首选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些富有的中国个人和精明的中国企业正大举买入世界级城市中的物业。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报道，大型全球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ichard·Ellis)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富裕中国人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金额将达数十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是中国买家首选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些富有的中国个人和精明的中国企业正大举买入世界级城市中的物业。

《福布斯》表示，关于中国买家新达成的房地产交易的新闻每个季度都会见诸媒体。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人大肆购入美国房产的时期。现在则轮到中国人。根据大多数估计显示，中国人正在抢购

洛杉矶、旧金山尤其是纽约的高档物业。据 Realtor.org 报道，在加州，中国人是房地产市场上第三大外国购买者群体，仅次于墨西哥人和菲律宾人。

在纽约，中国人是仅次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富翁的第二大买家群体。对比发现，在 50 个州中，中国人购买的美国房产比印度人、墨西哥人或英国人要多。尽管墨西哥人在加州和美国南部是一个庞大的购房者群体，但中国人在 44 个州都排名前五。

众多公司开始迎合这群渴望寻找自己梦想住宅的“地球漫游者”。中国人既把海外房产看作一个投资机会，也将其视为自己在中国之外的第二处个人住房。眼下，住宅物业和商业房产一样火爆。中国投资公司正四处购买商业房产。

目前，中国投资者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经济衰退以来最糟糕的止赎危机后，价格非常便宜。美国相对便宜的住宅价格，加上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严格的调控措施，正推动中国人对美国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创下历史纪录，跨国智库 Asia·Society 如是表示。

《福布斯》还称，美国不是唯一一个张开双臂欢迎中国房地产商的国家。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日前以 3.87 亿美元购买了英国伦敦劳合社(Lloyds·of·London)的地标性建筑。一位加拿大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年轻一辈的中国人正开始来到多伦多，并在当前快速升温的房地产市场中进行投资。

报道最后表示，如果世邦魏理仕中国的报告正确的话，那么来自中国的房产买主们刚刚开始涉足海外市场。世邦魏理仕表示，未来几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者很可能会花费共计 1.1 万亿人民币，大举购买海外物业，其中包括住宅和商业地产。

(环球网)